

教育兴教

与

教育兴国

陈兵

清末，佛教随中国末代封建王朝的衰朽而老迈不堪。面临列强的宰割、西方科技文明的强力冲撞，爱国志士纷纷谋求自强之道，在一批贤达力倡教育救国的同时，佛教界也提出了办学兴教的口号，有感于“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的状况，曾游观欧亚，颇具近代世界眼光的杨仁山居士，受基督教和日本佛教开办宗教院校的启发，呼吁中国佛教“欲求振兴，惟有开设释氏学堂，始有转机。”伴随着采西方教育体制的新学堂的遍地开办，取新学堂体制的佛教学堂，开始出现在神州大地上，与一些长老们为对付

庙产兴学风潮而开办僧学不同，杨仁山居士于1908年在金陵刻经处举办的“祇园精舍”，是一所虽用了佛教旧称，而实以培育弘法人才为旨的真正的新的佛教学堂。此后，办学为兴教之根本，被越来越多的教界人士所体认，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观宗学社、华严大学、汉藏教理院等佛教院校相继开办，至四十年代，国内佛学院校多达数十所。

办学兴教与教育救国，内涵虽有不同，但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古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毛泽东说：“人的因素第一。”以人为本，乃中华文化的一大传统。一切文化，的确都是人的创造物，佛法更说“一切唯心造”，能创造的主体——人，当然是决定经济政治文化等所造物的根本。欲扭转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国运，须赖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欲振兴积弊丛生、孱弱衰竭的佛教，岂能没有大批有愿力、有德行、通佛学与世学的佛教人才，尤其是历来作为住持佛法主体的僧才。大批人才从哪里来？只有全力办学校培育。

杨仁山、太虚、欧阳渐等大德之办学兴教，不仅出于以个人信仰为本的护法悲愿，而且出于佛学救国的爱国热忱。他们从佛教的社会功能和佛教与中国的密切关系着眼，将办学兴教看做救国兴邦不可或缺的大业。杨仁山强调“东亚各国，虽变法维新，而教务仍旧不改，且从而振兴之，务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之地。”我中华长期以儒释道三教教化，历代尊崇，而佛教衰坏已久，“若不及时整顿，不但貽笑邻邦，亦恐为本国权势所夺。”《支那佛教振兴第一》）他提议各地寺院提供经费，开设释氏学堂。他自己率先举办祇园精舍，不仅为本国培养弘法人才，还有为复兴印度佛教输送人才的打算。太虚大师从“以佛法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人间佛教思想出发，以办学育僧为其弘法活动的重点，他的业行中，表现出一种救国兴邦的炽烈爱国热情。

杨仁山等大德参照西学尤其是日本佛教院校的体制，设计了创办佛教学堂的方案。杨仁山提出从内外兼学进至深入佛学的三级九年学制，设想九年毕业，方可做方丈、说法传戒。太虚大师设计了小学部、中学部、学戒部、大学部、研究部五级制佛学院，以后又提出在佛教办小学、中学的基础上，设律仪院、普通教理院、高等教理院、参学处四级九年制佛学院。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他们的办学方案未能变为现实，但自祇园精舍以来的数十家佛学院，率皆改变中国佛教传统的师徒授受式教学法，采用新学体制，课程以佛学为主，兼学文史外语，如祇园精舍开

设佛学、语文、梵文、英文等课。欧阳竟无居士创办的支那内学院，下设问学、研究、译述、考订、刻经、宣传等部及法相大学，教学与研究、翻译、刻经齐头并进，开设有“佛学五科”（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因明、梵文等课程，教学采用讲演、讨论、指导研究的方法。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设专修班、大学部、研究部，开讲的课程除佛学重要经论外，还有印度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学、佛教各宗派源流、中国哲学、汉语、日文、梵文、英文、藏文、伦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闽南佛学院开设的课程曾多达五十余门，文化课程有数学、历史、地理、科学概论、哲学、世界宗教、教育学、艺术等。学生多由僧俗兼收转向专攻僧人，由居士主持的支那内学院则主要收在家人。由僧人主持尤设在寺院内的多数佛学院，多实行学修一体化，学生依丛林规范，课诵、坐禅、出坡劳动、支那内学院等亦强调知行合一，以师、悲、教、戒为院训。在注重信仰、愿力的培养与佛法的实践方面，佛学院继承了传统佛教教育的精神，与一般新学校有所不同。

出现于经济萧条、战乱连年的旧中国之佛学院，生存大多艰难，多数寿命不长，如祇园精舍只办了两年，北平柏林教理院（太虚创办）成立一年多即停办。维持时间最长的支那内学院，有三十年的院史（1922—1952年）。其停办的原因多数是经费无着。除经费问题外，师资缺乏，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视师、生条件而开设课程，是普遍存在的状况。除内院、武昌、闽南、汉藏教理等几年较好者外，其余佛学院，大多实际上只是佛学培训班。巨赞法师曾向笔者描述过解放前多数佛学院的实况：“在庙子里拨出两间破房，摆上几张桌凳（有的只有砖头木条搭就的坐凳），请一二老和尚讲讲国文，佛教三字经、弥陀经之类，就叫做佛学院了。”尽管如此，佛学院还是培育出了数以千计有文化、懂佛学，具备讲经、写作、编刊等能力的佛教人才，在佛教复兴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改变了清末僧尼百分之八十以上不识字的局面。现代佛教僧俗二界的两面大旗——太虚与欧阳渐，即出自祇园精舍，仁山、法尊、持松、法舫、显荫、常惺、慈舟、福善、震华、印顺、白圣、芝峰、谈虚、宝静、正果、巨赞、观空、明真、净严、星云等高僧，及陈铭枢、王恩洋等居士，皆出身于佛学院。三十年代以后，弘扬佛法的主导性人物，佛学院出身者逐渐占了多数。佛学院尤其支那内学院、汉藏教理院还为学术界培养出了一批佛学研究人才，近现代在佛学研究上有建树的梁启超、梁漱溟、熊十

力、汤用彤、缪凤林、景昌极、李证刚、谢无量、巴宙、张曼涛、谭壮飞、巫白慧、郭朋、田光烈等，率皆曾就读于佛学院。当代著名的佛学研究专家任继愈（师承汤用彤、熊十力）、杜继文、高振农（师承内院院长吕澂）、方立天（曾听课于中国佛学院）诸先生，也都与佛学院有间接或直接的学问因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协集中力量办了一所“中国佛学院”，十年间培育僧才四百余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该院停办十多年，造成今日佛教人才青黄不接的后果。可叹的是，在“中国佛学院”停办后不久，各地大学也停办数年之久。直到改革开放，废学误国的恶果得到反省，科教兴国的口号再度提出，随世俗教育的不断发展，佛学院校也劫后重生，形成了初、中、高三级体制，大陆佛学院目前已多达三十余所，培养出的僧才，正在接续传佛慧灯的重任。港、台两地的佛学院，也有数十所之多。这批佛学院，是未来中国佛教命脉之所系，如同教育事业是未来中国命脉之所系。

佛学院与一般学校既有同样的体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佛学院面临的问题比一般学校更大：在经费、师资方面，佛学院比一般学校更为困难；在教学方法方面，应试式、注入式教育及注重知识而忽视人格培养和操作能力的缺陷，佛学院校也普遍存在，作为以培养宗教教师为旨的佛学院，在佛法修证方面的薄弱，更是致命的问题。这一问题太虚大师便曾谋求（下转 22 页）

智慧相生”的教育方针。至 95 年已有工业管理、机械工程、电子工程、建筑、工业设计、中文、外语七系,东方人文思想、机电工程两个研究所。1994 年慈济护专扩大为慈济医学院,设有医学系、医事技术学系、公共卫生学系和护理学研究所。课程以生命科学及医疗知识为主,兼顾人文社会学科与艺术类,通识教育课程摒弃传统的全年单一课程模式,采用每学期分段式多单元教学规划,涵盖 16 项怡情养性的单元科目。慈济以公费与建立慈诚懿德会为其特色。尤其是后者为每十个学生安排一位慈诚师兄与两位懿德母姐,帮助学生克服心理、情绪上的困扰。总之,力求各方面都体现出“尊重生命”和传承佛教“慈悲喜舍”精神。正因如此,慈济扩大为学院不到两年,其医学系在台湾联合招生中,已进入前十名。华梵与慈济两院都有宏大的近期发展与远景规划。与此同时,释了中创办的玄奘人文社会学院、释星云创办的佛光大学、释圣严创办的法鼓人文社会学院也在筹备发展之中,目标均是综合性大学,规模宏大。

无疑,台湾佛教已打破了历史形成的基督教、天主教团享有办高等教育特权的局面,前景喜人。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忧。蓝吉富认为,台湾佛教没有象日本佛教那样的组织严密的宗派作学校的后盾,大规模办学需考虑长期的经费来源。江灿腾指出,暂时应整合力量和资源,以佛学研究所为主,培养佛学了望台型的学术人才。尤其是除慈济外,各校都重在人文社会学科,是否会造成信众资源的重迭与佛教界力量的浪费?

香港佛教以办社会教育为其特色。香港佛教联合会于 1959 年主办的第一所中学是佛教

黄凤翎纪念中学,开了以捐资者的名字命名,由佛教界主办的良好风气。60 年代由佛教界主办的中小学逐渐增多,如道慈佛社建立了九龙学校,佛联会创立了菩提学校,香海莲社创立念慈学校,佛教文化艺术协会创立了慧泉小学,佛教大光园所办的大光小学扩展为大光中学,正觉莲社建立了正觉学校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佛教界努力下,“佛学科”于 1960 年被列入中学会考课程与香港经纬书院于 1963 年首设佛学系。此外大屿山慈兴寺曾于 1965 年兴办了天台佛学院,可惜为时未久。70 年代至 90 年代,香港佛教教育迅猛发展。1971 年香港能仁书院成立,这也是现存一唯一的佛教界办的大专,设有文学、哲学、商学、佛学等系与哲学、中国文学两个研究所。据高永霄《香港佛教发展史》一文统计,现有佛教中学(包括职业学校)18 所,小学达 28 所,幼稚园 17 所。中小学均设有佛学课程。在校生总计达 10 余万,在全港适龄青少年中,这是不小的数字。此外,香港一些佛教或佛学团体还为初学者开办了数十届佛学星期班与短期班,为有志进修者开设佛学讲座。香港与台湾佛教界办的社会教育均接受一部分政府津贴。

百年来,包括两岸三地在内的中国佛教教育已有了开拓性的进展。但在新世纪的佛教应与世界各大宗教携手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历史要求面前,与数百年来遍布全球的基督教教育相比,作为大规模事业的中国佛教教育仅仅是开端。因而需要不断回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持续推进。

(作者系无锡轻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多所佛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上接 7 页)解决,但至今尚未得到根治。台湾有以培养禅师为旨的禅学院之设,是一可行之策。另外,仅以出家众为培养对象,也过于偏狭,还应有居士佛学院、夜间佛学院、假期佛学院、短期佛学院、专宗佛学院等多种教学体制,以提高广大佛教徒的佛学水平。

教育兴教与教育兴国在二十世纪的首末两度兴起,其间的因缘及兴学、兴教、兴国三者间的微妙关系,是一个值得研讨深思的重大问题。

(作者系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